

「学术·田野·传承」
民族学人类学丛书



QINGDAI GUANGXI MINJIANXINYANG ZUQUN
YU QUYUSHEHUI YANJIU

清代广西民间信仰
族群与区域社会研究

滕兰花 胡小安 / 主编

民族出版社

非
外
借

“学术·田野·传承”民族学人类学丛书

清代广西民间信仰、 族群与区域社会研究

滕兰花 胡小安 / 主编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广西地区民间信仰、族群与区域社会研究/滕兰花, 胡小安主编.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17. 6

(“学术·田野·传承”民族学人类学丛书)

ISBN 978 - 7 - 105 - 14955 - 1

I. ①清… II. ①滕… ②胡… III. ①信仰—民间文化—研究—广西—清代 ②民族社会学—研究—广西—清代 IV. ①B933 ②K280. 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60954 号

策划编辑: 虞 农

责任编辑: 陈 萱

封面设计: 金 晔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 编: 100013

网 址: <http://www.mzpub.com>

印 刷: 北京彩云龙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数: 350 千字

印 张: 12. 125

定 价: 36. 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4955 - 1/B · 786(汉 271)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编辑一室电话:010 -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010 - 64224782

国家民委“中国南方与东南亚跨境民族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资助

“广西与东南亚民族研究”人才小高地项目资助

广西教育厅“中国南方与东南亚民族研究中心”项目资助

广西教育厅“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协同创新中心”项目资助

广西教育厅民族教育专项——民族院校特色学科建设经费资助

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博士点建设经费资助

“学术·田野·传承”民族学人类学丛书
广西民族大学中国史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集

编委会主任：周建新

编委会委员：王柏中 玉时阶 吕俊彪 李富强

郑一省 郑维宽 罗宗志 唐晓涛

秦红增 黄家信 吴国富 滕兰花

龚永辉 廖明君 唐国军 甘品元

序 言

1998年，广西民族大学（当时为广西民族学院）获得民族学第一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至今已经18年了。

18年间，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广西民族大学全体同仁的不懈努力，我们于2005年获得民族学一级学科硕士点，2013年获得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点，2014年获得民族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民族学学科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国内民族院校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强。

18年间，本人亲历了民族学从本科点到硕士点再到博士点学科建设的整个过程。1997年，本人担任当时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副书记、副所长职务；2001年，接任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职务；2003年，担任第一任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职务；2014年本人辞去院长行政职务，但继续担任民族学一级学科带头人，负责民族学学科建设整体的学术工作。作为学科建设过程的亲历者，本人深感今日之成绩来之不易，它是几代人不懈努力的结果。为此做出贡献的前辈有已经过世的陈衣教授、姚舜安教授、程方教授、张有隽教授等，还有退休后仍然活跃在学术界的范宏贵教授、徐杰舜教授、周光大教授、谢崇安教授、覃主元教授等。当然，更多的是目前在岗工作的一大批中青年学者，他们正是这套丛书各分册的主编。

从1999年开始招收第一批民族学硕士研究生至今，我们已经招收了17届硕士研究生共438人（1999级4人；2000级6人；

2001级5人;2002级7人;2003级13人;2004级37人;2005级39人;2006级48人;2007级26人;2008级29人;2009级37人;2010级37人;2011级35人;2012级32人;2013级34人;2014级25人;2015级24人),已经有14届学生共355人(截至2012级)顺利完成了自己的学业(民族学、中国少数民族史、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中国少数民族艺术、民族教育、壮学与瑶学),走向社会各个领域,为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18年的民族学硕士点建设过程中,我们曾经于2006年开始先后出版了《寻山问野》《田野调查报告——文化诸相的探索》等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集。其中,第一本毕业论文集《寻山问野》就是在本人主持下编辑成册的,但遗憾的是,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此项工作未能坚持下来。

如今,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学科建设已经迈上了新的发展台阶,从最初的一个二级学科硕士点发展到现在的博士后流动站、一个一级学科博士点、一个一级学科硕士点、七个二级学科硕士点。我们现在不仅有雄厚的师资队伍,优秀的学生群体,而且还有充裕的学科建设经费,这就为我们继续出版优秀硕士毕业论文提供了条件。因此,为了总结经验,积累成果,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决定,突出本校民族学田野调查特色和优势,出版《“学术·田野·传承”民族学人类学丛书 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集》。这可以看作是我们过去工作的继续和深化,也可以看作是又一个崭新的起点。

丛书筛选的论文,主要是从民族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中国少数民族史、中国少数民族艺术、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等二级学科硕士点的毕业论文中挑选的,涉及领域较广,主要是以导师

优选出的弟子的毕业学位论文为主。论文选题内容丰富，但总体方向始终以中国南方与东南亚民族研究、广西世居民族研究、华人华侨研究等为主，同时也兼顾其他方向的研究，总体体现了我校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特色和优势。

丛书汇聚了学子的心血，更凝聚着导师的心血和关爱。丛书的内容虽然以学生毕业论文为主，但也有个别加入了教师的论文，这主要是为了体现师生学术传承的脉络。论文集收录的论文虽然有些还显得稚嫩，但我们知道，正因为如此，更需要我们的支持和提携，日后他们才能长成参天大树。

本套丛书的出版，得到中国南方与东南亚民族研究中心项目经费的资助，谨表衷心的感谢！我们希望以此种形式，不断推出新人，同时又积累成果，并且对促进教师教学水平，对我们继续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鼓励学生潜心向学，进一步加强学科建设，等等，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感谢学校、学院、全体老师的大力支持！感谢毕业学生的积极配合！

衷心祝愿广西民族大学的民族学学科建设明天取得更大的成绩！

周建新

2016年5月于广西民族大学基地楼办公室

从民间信仰与族群研究 发现历史（代序）

胡小安

一、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民间信仰和族群研究

关于信仰和族群的研究，早已是人类学和历史学界热门的话题，因为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地方性知识、历史信息与其他重要信息，是了解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文化不可忽视的课题。

民族学和人类学试图对民间信仰用“深度描写”和建立“地方性知识”的结构方法来理解文化的多样性，而历史学则希望探究其文化结构的过程。与对正统的宗教史如佛教道教史的研究不同，中国历史学界在传统政治史范式之下，对民间信仰的研究向来并不特别关注，除非是这种信仰对改朝换代或农民起义起到了重要作用。于是，民间信仰几乎成了民族学民俗学研究的专利。从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钟敬文诸先生对中国民间灶神、社神等神灵的研究到20世纪80年代乌丙安的《中国民间信仰》，尽管有历史学背景，但是其取向并不是以历史学为主。早期文化史和文化地理学也持同样的态度，即更关心某一种民俗“是什么”而较少探究其在国家与民间社会共同作用下各种关系“怎么样”，层累地变成了什么样子，反映了什么道理。

受到民俗学的影响,以及“打破帝王将相的历史”的史学需要,从20世纪30年代直至20世纪80年代,早期社会史研究对民间信仰的关注逐渐增多,为后来区域社会史或历史人类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但这时主要还是把民间信仰当作一种文化习俗和社会生活形式来研究,重在探究其在某个历史时期的静态现象,与民俗学堪称殊途同归。以至于学者们多关注其中细节的真伪,而较少关注民间信仰(包括其中的具体仪式)如何被创造、被记忆、被传播,以及背后复杂的社会具体场景、关系和社会变迁过程。

历史人类学取向则大大改变了这一局面。在历史人类学看来,神明信仰研究是观察传统社会发展史的独特视角。比如滨岛敦俊、刘志伟、陈春声、赵世瑜、郑振满等学者强调通过民间信仰来审视国家与社会以及地方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滨岛敦俊所著《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郑振满、陈春声合著的《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赵世瑜的《小历史和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和实践》,陈春声的《信仰空间与社区历史的演变——以樟林的神庙系统为例》,刘志伟的《神明的正统性与地方化——关于珠江三角洲北帝崇拜的一个解释》,郑振满的《神庙祭典与社区发展模式——以莆田江口平原为例证》,都以不同的案例展示了民间信仰所体现的国家与社会,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些研究堪称经典。

概言之,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民间信仰研究,与其说关心信仰本身,不如说更关心信仰产生的社会,承载信仰的那些人。透过信仰和族群的关系史研究,可以更好地认识国家、地方和不同人群的权力表达关系。科大卫教授认为,没有参加过乡村宗教活动,绝对不能了解乡村的历史。因为乡村社会的地缘关系往往建构于拜祭的

对象。^① 陈春声教授在对潮州和韩江流域的民间信仰进行深入研究之后认识到，围绕着村庙的活动，往往深刻地反映了地方文化资源和权力结构的历史变迁与存在实态。在日常的与宗教或仪式有关的活动中，对乡民们的态度和行为影响最直接的，除了一系列“灵验传说”外，常常还有与地域社会和社区生活内部的权利义务关系有关的那种“有份”或“无份”的感觉。在追寻民间神信仰的历史根源及其意义转换时，要力图从历史上当地人的解释来理解这种信仰的文化含意。倡导用“整体历史”的观念去理解地域社会的历史脉络，而将乡村及其信仰置于地域社会的脉络之中，以理解乡村的故事与国家历史的关系。^②

任何一种信仰，它的产生、传播、被接受，都是一定的人群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下完成的，不可能具有超地域超时间的万能力量。因此所谓“信仰圈”概念只有文化意义上的类似性，而没有实质的同质性，正如华琛所言：“中国官府对待文化整合方法的天才之处正在于此：国家强加的是结构而不是内容。庙宇崇拜的实际组织工作下放给对方精英，而与国家官员保持良好的关系，对后者来说大有好处。这一体系的弹性，足以让社会等级所有阶层的人都建构着自身对国家认可神明的表述。换言之，国家倡导的是象征而不是信仰。”^③ 就如不同地区流传的牛郎织女故事（包括流传到越南、韩

① 科大卫：《告别华南研究》，转引自《学步与超越：华南研究会论文集》，香港，香港文化创造出版社，2004。

② 陈春声：《信仰空间与社区历史的演变——以樟林神庙系统的研究为中心》，载《清史研究》，1999（2）；《正统性、地方化与文化的创制——潮州民间神信仰的象征与历史意义》，载《史学月刊》，2001（1）；《乡村的故事与国家的历史》，见《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③ Watson：“Standardizing the Gods”，P. 24，转引自葛兆光主编：《“民间”何在，谁之“信仰”》，14页，北京，中华书局，2009。

国的一些东西)，在不同地方是不同的表达。即便是官方大力推行的孔子与关帝信仰，假如没有统一的学习教材，那么它的一致性表达也是很难达成的。而民间信仰没有这个条件，也正是这样才保证了我们民间文艺的丰富性。在被官府认可的神明的大背景下，民间自身的辗转流传和习得，就具有更多的模仿和不同质之处。

陈春声教授同样指出，官方祀典和民间信仰的认知结构和仪式行为会发生变迁，而具有地方社会领导者身份的士大夫集团，其所作所为既构成这一社会变迁过程的内在因素，又塑造了当时人及后来者关于地方历史和地方文化的“集体记忆”。^①本书中郭文娟和谢小兰对壮族地区接受妈祖和北帝的信仰也作如是观。这些信仰的接受既离不开国家正祀的影响，又离不开包括外来商人在内的地方权威人物的提倡和实践，在这种环境影响下，时日既久，遂成为一种习惯和历史记忆，深深地融入地方文化中去。

当然，我们认识到在大一统表象下的差异性还远远不够，正如赵世瑜教授在回顾明清学界关于信仰和族群认同方面的讨论时所指出的，信仰的差异性认识只能是我们认识的起点，我们最终要通过这些切入点来认识明清“国家的形成”。^②

对历史上族群的研究，更是近年来学界讨论的热点。对于族群的变化，同样也要注意文化、地方历史脉络与国家的共同作用，不能忽视族群中的不同群体对于族群建构的自动性和能动性。早在20世纪60年代，巴斯（Fredrik Barth）就指出，族群具有行动者建构

① 《正统性、地方化与文化的创制——潮州民间神信仰的象征与历史意义》，载《史学月刊》，2001（1）。

② 赵世瑜：《从移民传说到地域认同：明清国家的形成》，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5（4）。

的要素成分,集体身份包含建构、维系与改变的过程。^①20世纪90年代,赫瑞(Steven Harrell)通过对西南彝族的研究进一步告诉我们,族群是一种社会关系体系,“身份只是在特定地方背景和历史背景下同其他身份的关系与区别中形成的”^②。王明珂在《华夏的边缘》《羌在汉藏之间——一个历史人类学的边缘研究》《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和情景》等一系列著作中,都强调族群分类是他者界定和自我认同的过程。

对于岭南族群的研究,学者强调族群的流动性和身份变动不居的现象,比如萧凤霞、刘志伟的《宗族、市场、盗寇与蛋民——明代以后珠江三角洲的族群与社会》强调要在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过程中去考察社会类别的形构过程。陈春声教授撰文分析明代广东惠州府兴宁县族群关系时指出:在当时实际的社会生活场景中,族群关系一直变动不居,“土人”与“瑶人”,“山贼”与“民人”之间的界限并不像后人想象的那么清晰。^③他早前对“客家”形成的研究,也提出层累建构过程的观点。^④

赵世瑜教授在梳理“少数民族”概念时也谈到历史建构的过程。他指出,我们不能把“少数民族”这个概念不加分析地运用到

① 参见[挪威]弗里德里克·巴斯著,高崇译:《族群与边界》,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9(1)。这篇文章是巴斯主编的论文集“Ethnic Group and Boundaries”的序言。

② 赫瑞:《族群性,地方利益与国家:中国西南的彝族社区》,转引自《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23~24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

③ 陈春声:《瑶人、蛋人、山贼与土人——〈正德兴宁县志〉所见之明代韩江上游的族群关系》,载《中山大学学报》,2013(4)。

④ 陈春声:《地域认同与族群分类——1640—1940年韩江流域民众客家观念的演变》,转引自《近代中国社会与民间文化——首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历史上去，在华夏一汉人没有作为主体民族之时，在“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小雅尽废，四夷交侵”的时代，谁是“少数民族”？即使是秦汉以降，中原王朝逐渐占据优势的文化地位，视周边各族为蛮夷，但人家未必就承认自己是“少数民族”，比如匈奴就未曾承认过自己是汉朝的“少数民族”。^①

众所周知，本书所研究之广西地处边疆，边疆族群的区分和认同往往是与王朝力量进入边疆以及地区开发密切相关的，开发不仅仅是经济的变动，而应理解为一种外部力量进入某地而带来的经济增长、人群变动、文化建构、秩序调整的过程。族群的区分与认同，往往与地域或超地域的认同联系在一起，最后“* *族”与“* *人”的认同交错在一起，如何对不同的人群进行不同的叙述，势必要依据不同的情境和场合。在本书中所提及的僮人与汉人、客家与土人，包括不同地域来源的人群，他们之间的区分和认同，融合和冲突，都说明了族群身份和族群性建构、表达的复杂性。

总之，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信仰和族群研究，是要探索其历史过程，进而认识和解释文化结构的过程。正如陈春声教授所言：

要理解特定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有贡献的做法不是去归纳“特点”，而应该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揭示社会、经济和人的活动的“机制”上面……置身于历史人物活动和历史事件发生的具体的自然和人文场景之中，切身感受地方的风俗民情，了解传统社会生活中种种复杂的关系，在这样的场景和记忆中阅读文献，自然而然地就加深和改变了对历史记载的理解。

① 赵世瑜：《后现代史学：匆匆过客还是余音绕梁》，载《学术研究》，2008（3）。

研究者也可以更深切地理解过去的建构如何用于解释现在，结合实地调查，从不同地区移民、拓殖、身份与族群关系等方面重新审视具体地域中“地方性知识”与“区域文化”被创造与传播的机制，就会发现，许多所谓“地方性知识”都是在用对过去的建构来解释现在的地域政治与社会文化关系。^①

二、清代以降广西地方的信仰与族群问题

具体到广西这个关系复杂而特殊的区域，各地情况又千差万别，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去重新发掘、阐释和解释。由于地理位置、历史渊源和文化影响，广西本身扮演着不同身份：从中原帝国和士人的眼光来看，这是边陲和“炎荒烟瘴之地”，同时也是重要的战略地区，朝廷经略岭南、西南和东南亚，不可不关注广西；从明代广东日益发展之后，以广西人自己的眼光来看，“两广”的联称既代表着政治经济的地域联系，也代表着一种自豪；从广西内部来看，有经济文化接近湖南的桂东北地区，有经济文化接近广东的桂东南地区，有连接着贵州、云南“蛮夷”地区的桂西土司区域，等等，因此内部也存在着不同地域的区别和认同。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在具有历史人类学视野的学者看来，实在是难得的研究宝库。

我们已经知道，明清时期是广西发展非常重要的阶段。首先是国家的力量和影响更加深入到边疆，国家通过更加严格的土司制度、置官设学、卫所移民制度，把内地和边疆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其次是边疆的人群结构随着土司兵的调遣、卫所的移民、各类

^① 陈春声：《走向历史现场》，载《读书》，2006（9）。

士农工商人员的流动而发生了更大的变化，经济交流得也更加频繁；再次是各种利益、文化、信仰、神明由此发生更多的交融整合，也出现了一些矛盾与张力。本书的文章正是围绕着这几方面的主题来深入观察明清以来的广西，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具有不同身份的广西复杂多样的形象。

本书的几位作者中，王雨对伏波将军马援崇拜的缘起和演变做了梳理，虽然略显稚嫩，但问题意识非常明确，即通过信仰的演变来观察作为边疆地区的广西在帝国体系中地位的变化。伏波将军马援成为神灵及其灵异故事被各方不断重述、增加各种因素，并沿着邕江、左江向各地扩散，既说明帝国随着局势的不同对地方神灵的态度有所不同，也说明地方社会试图用国家的话语来重构自己的历史，把地方传统的文化和记忆用正统的话语来加以包装和表述。文中有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早在明代嘉靖年间在与交趾复杂的关系中，地方官用伏波的形象来区分地方人群对国家的忠诚问题。假如联系到中越边境对伏波将军马援的形象记忆，则地方官运用此形象不光是区分“敌我”的问题，而是地方可以接近国家的一种手段，也是对安南的震慑，因为“铜柱折，交趾灭”的古语至迟在南北朝时期就有。但是地方人群对外来的伏波庙并不十分感兴趣，反而对本土女性班夫人的信仰更虔诚。一些班夫人的传说估计便是此时大力创造的。这说明了什么？其背后是什么样的力量推动？即是通过地方信仰的问题，看到国家在地方怎么做怎么实施统治，而地方同样在国家的议题之下怎么做怎样说。

郭文娟对流播于广西中部地区（大致即今天的柳州、来宾、河池诸市部分地区）的妈祖信仰做了较深入的探究。其结论是，随着外来移民的增多，带来的信仰也逐渐复杂，在长期与当地土著的交流过程中，妈祖信仰最能体现文化融合的途径。在对妈祖信仰在桂

中地区的传承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全面梳理的基础上，探讨了妈祖信众与区域社会秩序的构建的关系。

谢小兰对南宁地区八尺江流域做了历史民族志式的描写。她看到，自明清以来，经济特别是商品贸易的发展，圩市不断繁荣，大量粤商因经商到达此地，并逐步迁徙到八尺江流域这片壮族聚居地定居。从这批移民的籍贯来看，主要有广东、湖南、江西等省份，但以广东籍的人口数量最大，而且商业移民为主。移民的迁居不仅改变了八尺江流域族群构成，也带动了此地区经济的发展。此外，移民的迁入还促使八尺江流域的民族文化不断变迁，主要表现在方言的变迁、戏剧多元化、信仰的互融等方面。在移民迁入的同时，他们家乡的北帝、妈祖等信仰也开始在这片地区落地生根，与当地的花婆信仰相互融合，形成多种民间信仰共存的局面。

吕小梅对清代柳江上游之都柳江地区的经济与族群进行了考察。都柳江的繁华肇始于清雍正年间新辟苗疆时贵州巡抚张广泗疏通其航道。^① 在此之后直至20世纪50年代，都柳江航道一直扮演着黔桂粤三省的经济交流孔道的角色，黔桂的山货、木材运出，粤桂的百货、海盐运入，大部分依靠都柳江航运。在清至民国时期，不少经济型移民闻风而来，或经商（多为包括客家人在内的闽粤商人），或务农，众多圩镇沿江兴起。外来移民的到来，不但促进了本地的经济发展，也带来了商业移民的文化，使得都柳江流域内逐渐形成汉、侗、苗、瑶、壮多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的族群互动局面。作者主要以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的个案，展示了这个复杂丰富的区域历程。

以上王、郭、谢、吕的文章多以较大区域为视点，以信仰、经

^① 其过程参见张应强：《木材之流动：清代江下游地区的市场、权力与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济文化交流为切入点，对族群的交往做了全方位式观察。而倪升晓的论文则以南宁附近至横县、宾阳即清代的永淳县为视域，对集中爆发于清后期的族群冲突问题做了考察。由于历史上不同族群（屯人与甲人）的身份地位和入籍方式不同，造成其权利义务关系和在官府的地位亦有所不同，从而造成屯（壮）甲（汉）之间的矛盾，最后在一系列因素刺激下发生了清末咸同十几年的族群大“动乱”，其后续影响一直持续到民国年间。该文主要探究在这场“动乱”中，官府、富裕客人（甲人）、僮人（屯人）等各人群的应对策略，从而去理解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关系，认识到“动乱”虽然给该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但同时“动乱”作为一种社会的整合方式，能够打破旧有的族群关系格局从而建立了新型的族群关系，从而达到整体理解社会“动乱”的目的。文章提到，由于太平天国后期石达开率部回师广西，使得该地区原有的各种斗争达到新的阶段。这样，永淳地方的“动乱”与太平天国运动发生了密切联系，长期以来这些地方“动乱”往往被看成是太平天国运动的组成部分。我们通过该案例的分析，可以了解太平天国运动内部的复杂性。

本书选题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多为广西区域研究较少关注的薄弱环节，这些研究有效推进了广西边疆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最值得称道的是其资料来源的多元化与多学科理论方法的综合运用。作者们以历史人类学方法和视角为出发点，结合田野个案研究的形式，获取大量的民间文献资料，不但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和可读性，而且进一步促进了广西民间文献的收集整理。

当然，我们仍然只能说这些作品是历史人类学方法的习作而已，其对围绕信仰和族群的各种权力关系的探究力度还不够，对区域自身脉络的认识尚有不足，离真正成熟厚重的历史人类学著作还有一定的距离。较好的历史人类学视角下的作品，不只是叙述一个